

论美国霸权秩序理论的两种版本

陈建洪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美国追求霸权、遏制其他大国尤其是遏制中国发展的行动不仅没有停歇，而且进一步加剧。美国为世界秩序提供了由其支配的全球霸权秩序方案，这个霸权秩序分为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两种具体思路。这两个版本都具有典型的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特征。充分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基本精神并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对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并有效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遏制政策，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均势体系；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顾历史，现代政治理念及其塑造的世界秩序在欧洲率先得到发展，并以欧洲为中心向外蔓延。欧洲的探险者越过大西洋，来到了新大陆，开拓了新世界。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伴随着欧洲内部列强实力的彼此抗衡和此消彼长，也伴随着列强对新大陆的占取和对旧大陆的瓜分。大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了新世界的核心区域。大西洋联结着欧洲大陆和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者和旧大陆的登陆者——欧洲——成了环球世界的中心。欧亚大陆的两端——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所在地带的发展逐步走向了不平衡状态。欧洲内部为了避免宗教战争逐步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1648年签定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标志着开始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主权国家成为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不过，主权国家的平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适用于欧洲内部。欧洲与其他大陆之间则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1815年的维也纳

会议确认了五个大国为主导的均势体系，构成了之后欧洲内部列强二百年间的基本结构。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欧洲的均势体系，也结束了欧洲主宰世界体系的时代。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也未能持续太久。整个二十世纪至今，美国综合国力仍居世界首位。四百年间由欧洲主宰的世界秩序转向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格局瓦解之后，美国在单极世界中毫无掩饰地开始追求“全球支配地位”，追求“自由主义霸权”。安德森指出，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版本，另一种是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的“新帝国主义”版本。^①伊肯伯里也区分了两种版本，不过在表述上与安德森稍有不同。在伊肯伯里看来，小布什治下的新保守主义是不为世界接受的霸权版本，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才是可行的优质版本。像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则一边强调美国的绝对优势开始

动摇，另一边强调美国领导地位不可或缺。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驱使他断言新的国际体系会“朝着均势方向发展”，世界秩序不可能凭借一国之力即可获得。^②但是美国追求霸权主义、遏制其他大国尤其是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停歇，而且在进一步加速。今天，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精神并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对于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并有效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遏制政策，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新保守主义的斗争策略：以卡根为例

冷战结束之后，许多西方人士深信自由民主制在理念上的必然优势，而且相信这种制度必将在现实上自然而然地普世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之一卡根（Robert Kagan）——一位历史学者也是外交政策评论家——则持一种现实的斗争态度。根据卡根的论述，西方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在当前世界的优势并非出于理念上的自然，而是西方大国尤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民主国家经过斗争得来的果实。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维护自由民主制的斗争意识，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将面临威胁。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卡根明确地提出“历史的回归”。他认为，历史并未随着自由民主阵营的暂时胜出而告终结。康德的“永久和平”构想在世界范围内依然还是一个梦想。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仍然处于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之中，处于不安的斗争状态之中。

根据卡根的分析，当前世界的国际秩序主要由三大斗争构成：大国竞争、民主与集权之

争、伊斯兰激进主义与世俗强权之争。在卡根的分析中，前两种斗争显然比第三种斗争显得更为重要。虽然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重重，但毕竟暂时还看不到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形成竞争关系的可能。美国眼中的头号对手显然是中国。在这一点上，卡根非常坦诚：“‘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③只不过“9·11”事件的突然发生暂时延缓了美国的这一战略考虑。换句话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只是美国的战斗对象，而中国才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因此，卡根关于前两种斗争的分析都与中国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大国间的实力竞争，卡根特别分析了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伊朗作为区域大国的雄心。在这些大国中，日本和印度是美国的民主同盟，伊朗则被逊尼派国家或者说被诸多美国的盟友所包围，基本上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威胁到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俄国和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④相较俄国，卡根认为，中国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经济繁荣预示了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不过，卡根也自信地指出，要想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卡根从经济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虽然很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依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⑤卡根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崛起还没有给美国带来真正的挑战，至少不比冷战时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因为中国处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盟友的包围圈之中。只要这种包围存在，中国就很难成为“地区霸主”，遑论取代美国。^⑥针对美国衰落论的观点，卡根自信地指出，即便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那么容易追赶美国的全球影

响力。因此，卡根得出结论说，美国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民主政治、促进自由经济和协调大国平衡的主要力量。作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干将，卡根对中国及其崛起的态度并不友好，有些论述听起来甚至有些刺耳，他关于中国的论述至少提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内部面临着如何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问题，外部面临着如何突破或者化解美国及其盟友包围圈的问题。

卡根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及其背后的理念。他将以欧美为核心的国家形容为“民主阵营”甚至“民主轴心”，而将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贴上“集权机制”的标签。卡根认为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可以追溯至启蒙运动时期，而且这种斗争始终未有停歇，构成了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⑦。卡根指责“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不遗余力地捍卫现代政治体系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当然，卡根的指责主要在于批评这些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机制免受外来干涉。卡根声称，民主阵营的国家正在破除这一原则，以推进自由民主制的全球化步伐。^⑧卡根警告西方的理想主义者，自由民主并不是优越理念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斗争的现实成果。所以，他呼吁“全世界的民主主义者必须紧密团结起来”，主张“建立民主国家的全球性协调或同盟”，^⑨以维护现在的民主世界，塑造未来的世界民主。

卡根的指责首先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始终在维护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现代国际秩序的根本精神，也就是坚持主权神圣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反而言之，卡根实际上承认了，美国等国家致力于以人权和民主

的旗号推翻现代国际体系及其根本精神，积极干预他国内政。其次，卡根也不得不承认，连美国本身也并没有遵循这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立场。他坦承，美国“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而长期以来“与阿拉伯的集权政府结盟”并与若干国家的军人政权建立同盟。^⑩卡根的这一观点不禁让人对其坚持的民主原则心生疑问。既然应该提防中央集权制国家甚至要与之斗争，那么美国与集权政府和军人政权的结盟为何又是正当的？该如何解释美国的这种“战略与经济原因”的正当性？反而言之，美国似乎也并不喜欢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民主政府”。从根本上来说，塑造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还是国家利益。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一个论断倒是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美国人从来没有办法坦然公开承认他们本身有自私的利益心。无论是参与世界大战或介入地方性冲突，美国领袖永远声称是为原则而战，不是为利益而战。”^⑪其实，卡根也承认，连美国的盟友欧洲国家也并不很赞同美国的积极干涉主义。但是卡根始终坚持，不光中国、俄国是错的，欧洲也是错的。两者犯了不同的错。在他看来，中俄错在机制本身，欧洲则错在坚持启蒙理念。

由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⑫经历过创伤的欧洲战略文化的特点在于：“强调谈判，重视外交和商业关系；强调国际法，摒弃实力；强调说服，不进行威逼；强调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⑬卡根毫不掩饰地强调，欧洲立场的现实原因在于其实力的相对弱势，因为它没有实力像美国那样可以积极干预。从理念上讲，卡根认为，欧洲的生活方式值得尊重和保护，但这种生活方式只有在美国实力的保

护下才成为现实。如果没有美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积极干预和塑造,欧洲人的后现代天堂随时会岌岌可危。欧洲人却始终坚持永久和平的信念,美国人则务实地相信丛林法则。通俗地讲,欧洲人享受着后现代的天堂生活,美国人却运用自己的实力守候着欧洲的天堂并维护着艰辛的人间世。

在卡根看来,不光欧洲的后现代天堂需要美国实力的守候,世界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和和平秩序也都需要美国的超级实力。卡根深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永远保持不可挑战的强大地位。不过,他始终坚持,“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担负起维护世界安全、捍卫民主原则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卡普兰与卡根持有类似的看法。卡普兰把美国看作是这个世界冲突无序世界的“酋长”,为这个世界秩序提供“军事安全保障”。^⑭卡根看来,只有继续维护美国的超强实力,世界才有自由、民主、繁荣和安全。卡根还发挥了黑格尔关于美国地缘政治地理优势的论述,来说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曾经指出,美国不像欧洲,美国没有强大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实力上皆不足为虑,所以美国无需对邻国保持戒备状态。^⑮在这一点上,卡根认为,美国在地理上远离欧亚大陆的大国竞争,可以有效平衡大国势力,又没有强邻在旁边虎视眈眈,既可以放心地驰骋千里之外,又不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霸权邻居。^⑯根据这一点,卡根认为美国是最为理想的世界霸主。他坚持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比多极世界更为和平和安全,更能促进自由、民主和繁荣。

在卡根看来,美国实力其实并没有衰落,而且也不应该衰落:“如果美国真的处于衰落

之中,那么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其他大国很快会在它们各自所处的地区更加占据主导,而世界将回到类似于19世纪欧洲多极体系的状态。”^⑰他还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多极体系将引领人类走向多么可怕的状态。通过这种美国中心论的观点,卡根强调美国秩序的衰退或者衰落不光是美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为了避免不幸,“美国例外论”应该得到理解甚至鼓励。总而言之,卡根整个论述是为了论证美国例外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卡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美国中心论。不过,他的论述时而依赖民主原则,时而强调实力原则。在这两种原则之间不断转换,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其美国中心论的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卡根将民主原则嫁接色拉叙马霍斯“强权即正义”的观念之上。

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吸纳策略:以伊肯伯里为例

在一定程度上,倡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立场和新保守主义一样,都支持美国中心地位不可动摇。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家认为,美国秩序需要自我调整而采取协商和赢得同意的策略,新保守主义则强调时刻保持与竞争者甚至敌对者——包括中俄——之间的斗争,以强化美国秩序的有效延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也是美国战略理论研究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批评新保守主义的霸道和斗争策略,提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协商和同意策略。

伊肯伯里认为,奠定国际秩序的基础分为三种方式:制衡(balance)、统制(command)、

赢得同意 (consent)。用更加直白的话来说,这三种方式中一种是大国均势,一种是号令天下,一种是众星拱月。基于均势的秩序,其根本在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支配和控制秩序。基于统制的秩序,其根本在于唯一超级大国号令天下的等级秩序。基于赢得同意的秩序,其基础则在于通过协商建立规则和制度,明确权力的分配和运用权力的限制。^⑮

无论哪一种秩序的建立,其理论假设都是世界自身的无序。由于世界本身是无序的,才需要确立秩序。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假设人性本恶,断定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国家理论明确了,通过社会契约也就是通过同意,无序的自然人生活才能进入一个有序的政治生活。不过,霍布斯所建立的主权国家理论也明确了,在主权国家之上并没有更高的主权。因此,相互独立的主权之间始终“相互猜忌”,互相防备,互相刺探,始终保持着“战争的姿态”。^⑯因此,主权国家的建立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但是主权国家之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

伊肯伯里所说的三种秩序其实都是对这种无序政治世界的应对。主张均势的现实主义始终坚持主权至高无上和相互平等原则,并以大国均势作为无序世界的秩序稳定器。主张头号强国号令天下的霸权秩序则是以超级大国意志作为秩序的基础。这是一种帝国等级秩序,主导国的意志和权力远远大过其他主权国家。这个主导国可以强制实施自己的意志,也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建立秩序。这个霸权秩序中的规则和权利主要依靠主导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确立并强制实施。伊肯伯里所说的第三种国际秩

序,也就是通过协商赢得同意建立的秩序,这个思路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契约论在政治领域的应用。社会契约论旨在明确处在无序状态中的自然人如何通过社会契约而进入有序的政治秩序,赢得同意的国际秩序则将社会契约论分析人际关系的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上来。

伊肯伯里一方面把建立在同意基础之上的秩序与自由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试图将现实主义均势和霸权主义号令也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⑰他首先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过去两百年间构建自己、不断发展并占据优势地位。他明确地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认为“一种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和进步的秩序”。^⑱这也是当前美国政府不断重复的自我确认。显然,这种自我确认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政治宣言,而是有其理论基础的框架论述。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处于离岸状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方面,这是对欧洲自由主义理论自我构建的延伸;另一方面,这又是不同于以往的独特类型。它摆脱了欧洲大陆上建构起来的均势体系,开始构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直接确认为美国支配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意味着他认为可以忽略冷战时期一定意义上的两极均势体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但是还没有具备号令天下的帝国气质。伊肯伯里将冷战时期视为美国构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初期阶段,冷战之后则进入这个秩序的“全盛时期”。两极的另一极消失了,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完全站在了世界的中心”。^⑲在事实上,美国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中心力量。换句话说,美国作为无可匹敌的力量已经成为世界上事实的唯一霸权。如安德

森指出,对于伊肯伯里来说,自由主义规则与美国霸权秩序之间并不矛盾。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家来说,不仅没有必要谨慎地否认美国霸权,而且要大方地进行认可。^{②③}所以,对于伊肯伯里来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也就等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但是,伊肯伯里与新保守主义帝国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应该将不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吸纳进入美国秩序,而不是进行直接斗争和打击。如果说新保守主义主张美国凌驾于世界之上唯我独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理论策略上则稍显谦逊,主张美国应该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获得同意,从而深化美国秩序。对于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持和深化美国霸权秩序的问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新保守主义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但是,对于美国霸权地位本身的认可态度,两者并无实质差别。所以,伊肯伯里主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可以说等于是自由主义霸权秩序。

伊肯伯里认为,二战之后的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包含了三种秩序逻辑。也就是说,美国将均势策略、发号施令和赢得同意三种方法分别运用于世界的不同区域。具体而言,美国与西欧各国的关系“基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性的协议”。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则主要是“双边性的、附从性的”。这是说美国在东亚实行的是赢得同意的方式。最后,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美国则运用号令的方式,也就是采取“传统的帝国主义的控制工具”。^{②④}在这个意义上,伊肯伯里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同于以往的三种秩序,将均势、号令和同意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不过,伊肯伯里将美国秩序视为三位一体的观点有很多模糊不清和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作为霸权秩序的

等级结构,美国其实将自己与世界所有地区的关系都视为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伊肯伯里描述的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关系,看似是一种均势秩序,实际上是美国这个中心遥控的欧洲内部均势。美国与东亚所谓基于同意的关系,其实也是很片面的一种描述。这种关系也许可以用来形容战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即便是日本的同意,其实也是二战之后的不得不同意。美国与拉美以及中东的服从号令关系也只是一个局部描述,而且这个局部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当然,伊肯伯里可以退一步说,这只是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世界不同区域实施的不同策略,而不是指现实世界的整体结构。

伊肯伯里鼓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过他并没有鼓吹所有具体策略。其分析也离不开美国党派之间的路线之争。他认为突出问题就是美国具有超级单极的实力,但是没有拥有令人信服的权威。伊肯伯里批评小布什政府的具体策略就体现了这个有权力而无权威的问题。冷战时期,美国追求两套逻辑,也就是运用于西欧和东亚的两种方式。他称前者为“以规则为基础的逻辑”和“轂辐逻辑”。他批评小布什政府抛弃了均势思维,执迷于美国支配的万能,信奉一套“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世界秩序逻辑”。^{②⑤}伊肯伯里如此描述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矛盾之处:“它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美国支配世界但却不遵守规则的体系。”^{②⑥}伊肯伯里也承认,美国提供的这个体系就是帝国条款。换个表述来说,美国向世界提供了一份霸权契约,但世界没有接受这份契约。为了克服仅有权力但没有权威的情况,伊肯伯里认为,美国既需要超越“均势”也需要超越“帝国”,转向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新的国际秩序需要结合美国的单极实力与“经过普遍协商而得

的规则和制度”。伊肯伯里的立场主要在于论证：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有缺陷和弱点，需要重新调整策略和思路，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体框架依然坚固。所以，他主张调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具体策略，超越均势道路和帝国方式，通过协商和赢得同意的方式重建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伊肯伯里的讨论表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要是指美国及其盟国所想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伊肯伯里对中国的态度与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敌意不太相同。在讨论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伊肯伯里有几个观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承认中国崛起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戏剧之一”，中国是“新力量中心”崛起的“领衔主演”。二是伊肯伯里反对美国时代终结论的观点，也反对比如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关于西方沦落东方崛起的论述，虽然他承认中国可能会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主导国。三是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实际上颠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或根本不存在”。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一种国际秩序，是因为之前的旧秩序已经在战争中被摧毁。所以，中国要想挑战现有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秩序，其困难程度远远大于“仅仅对抗美国和抢夺国际秩序控制权”。中国无法也无力脱离这个框架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四是伊肯伯里有理由认为中国将继续积极寻求“融入一个扩展了的和经过重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了促成这一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应该“强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以回应中国的崛起。

伊肯伯里恰恰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及其基本精神的坚定支持者，美国政府则通常要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美

国政府的协商似乎越来越限于与其盟友的协商，其制定的规则也限于美国及其盟友认可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伊肯伯里所主张的与他所批评的自由主义帝国秩序仅仅存在着词语上的差别，因为这种帝国秩序无法与他所认定的对手——有时候甚至也无法和他的盟友——进行协商以制定双方皆可接受的规则。

结论

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家，其实都没有把美国及其盟友之外的世界共存者看作是真正的对话者。美国的主要方式是，要么在斗争中打垮你，要么以协商的方式逼迫你承认我定的规则。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框架理论，既有互相攻讦之处，也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立场。在一些议题上，两者具有合流的趋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可以说着自由主义的话，做着帝国主义的事。就其一致之处来看，两种理论都具有典型的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特征。基辛格形象地概括了美国例外论的矛盾信念：“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念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个内外有别的信念可以说是矛盾的，也可以说是不矛盾的。说它矛盾，是因为它宽于待己严于律人。说它不矛盾，是皆以美国的例外主义作为基础。这种例外主义认为美国具有“无可匹敌的美德和实力”，因此“要在全世界各地为其价值观念作战”。基辛格也把后者称作美国人的“传教士精神”。^②这也经常被看作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道德统一性”：“以自己的形象看待外界事物，以自己的设想判断外国生活”。这是一种咄咄

逼人的强制例外论。

与美国例外论的颐指气使不同，基辛格用“中国的例外论”来指传统中国温和的文明信仰。根据这种文明信仰，“中国人笃信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并邀请蛮夷到中国‘接受归化’”。^{②⑧}基辛格从外交的视野讨论了中国文明例外论的特点。这些讨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第一，中国自认为具有一套特殊而且优越的文明，对外邦以礼相待，但从不强迫外邦皈依这套文明及其价值。第二，中国不主动对外输出文明价值，但是欢迎外邦前来学习。^{②⑨}第三，传统中国农业高度发达而自给自足，因而不追求对外的领土扩张。^{③⑩}第四，中国并不过多干预他国内政，向其纳贡的藩属国享有近乎独立的自主地位。^{③⑪}中国例外论对于世界政治和天下秩序的认识显然植根于其古代文明传统，但是基辛格在讨论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也偶尔会将这两位领导人的外交手法与中国例外论的特点联系起来。这就意味着，对于基辛格来说，中国例外论并不仅仅出现在传统中国，而且在现代中国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中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从基辛格对中美两种例外论的讨论来看，传统中国朝贡体系的文明例外论显然比当代美国霸权体系的政治例外论更加具有文明价值和特征。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新中国始终保持有理有节。从总体态势来看，美国大体采取攻势，我们保持守势。但是，我们也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精神。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我们与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三个前提：一是行动前提，断绝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并不再勾结或援助它；二是态度前提，“向人民的中国采取

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三是建交原则，即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作为基础。^{③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行动上始终没有完全断绝和“中国反对派”的关系，在态度上也未采取真正的友好态度，在原则上也不太遵循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中国人要么“倒向帝国主义一边”，要么“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第三条道路。^{③③}新中国作出了明确的道路选择，毫不犹豫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从全球视野来理解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这种干涉看作是美帝国主义巩固欧洲、亚洲和美洲部分的亚洲战线。毛泽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以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由此展开了干涉和反干涉、侵略和反侵略、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两个大国，中国与美国曾经度过暴风骤雨的岁月，也曾经共享雨后初晴的日子。究竟会何去何从，对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基辛格曾经强调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并且提出以建立“共同进化”为主旨的太平洋共同体，以平衡太平洋诸国的利益与太平洋的和平。^{③④}不过，当今美国的选择看起来不仅远离了基辛格的均势共存，甚至告别了艾奇逊的所谓“友好”。

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代中国，都始终坚持“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

当代倡议,也具有“天下一家”的传统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天下一家而不是万国纷争,倡导文明互鉴而不是互殴,提议文明对话而不是对打。这事关全球秩序,也事关怎样塑造一个美好世界秩序。中国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美国提供了美国中心论霸权秩序的不同方案。如何智慧地处理好中美两种方案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是塑造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关键。

【注释】

- ①【英】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一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214—215页。
- ②【美】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8页;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4, p. 370, p. 373.
- ③【美】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 ④【美】罗伯特·卡根:《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陈小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页以下。
- ⑤【美】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4—118页。
- ⑥同⑤,第193页。
- ⑦同④,第98页、第120—121页。
- ⑧同④,第108—109页、第114页。
- ⑨同④,第158—159页。
- ⑩同④,第122页。
- ⑪同②,2012年,第830页。
- ⑫同③,第1—2页。
- ⑬同③,第56—57页。
- ⑭卡普兰:《武士政治:领导层为什么需要异教徒的精神气质》,丁力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1、173页。
- ⑮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 ⑯同⑤,第27页。
- ⑰同⑤,第125页。
- ⑱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 ⑲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6页。
- ⑳同⑱,第53页。
- ㉑同⑱,第1、14页。
- ㉒同⑱,第2页。
- ㉓同①,第184—188页。
- ㉔同⑱,第73页。
- ㉕同⑱,第219、225页。
- ㉖同⑱,第230页。
- ㉗同②,第2、829页。
- ㉘【美】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 ㉙同②,第13页。
- ㉚同②,第17页。
- ㉛同②,第73页。
- ㉜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6页。
- ㉝同③,第1473页。
- ㉞同②,第515—517页。

(截稿:2022年8月 责编:黄蕙)

作者简介 陈建洪,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导,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